



魯迅文集

文集

导读本

〔集外诗文选〕

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医药学院610 2 01025463

鲁迅文集

第 21 卷



集外诗文选

(下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集外诗文选(下)

文 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| (217) |
| 《奔流》编校后记(一一十二) | (225) |
| 哈谟生的几句话 | (263) |
| 关于《关于红笑》 | (267) |
| 文艺的大众化 | (273) |
| 鲁迅自传 | (276) |
| “日本研究”之外 | (279) |
|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| (282) |
| 今春的两种感想 | (284) |
|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| (289) |
| 文摊秘诀十条 | (293) |
| 英译本《短篇小说选集》自序 | (295) |
| 《文艺连丛》——的开头和现在 | (297) |
| 我的种痘 | (300) |
| 辩“文人无行” | (30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娘儿们也不行 | (312) |
| 选本 | (315) |
| 上海所感 | (319) |
| 自传 | (324) |
| 《译文》创刊号前记 | (327) |
| 做“杂文”也不易 | (329) |
| 势所必至，理有固然 | (333) |
| 题《芥子园画谱三集》赠许广平 | (335) |
| 《集外集》序言 | (336) |
| 《俄罗斯的童话》 | (340) |
|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 | (342) |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诗选 | (343) |
| 别诸弟三首 | (343) |
| 莲蓬人 | (345) |
| 庚子送灶即事 | (346) |
| 祭书神文 | (347) |
| 别诸弟三首 | (348) |
| 惜花四律 | (350) |
| 题照赠仲弟 | (352) |
| 自题小像 | (353) |
| 哀范君三章 | (354) |
| 哭范爱农 | (356) |
| 梦 | (357) |
| 爱之神 | (358) |
| 桃 花 | (35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他们的花园 | (360) |
| 人与时 | (362) |
| 他 | (363) |
| 题赠冯蕙薰 | (365) |
| 送 O. E. 君携兰归国 | (366) |
| 赠邬其山 | (368) |
| 无题 | (369) |
| 赠日本歌人 | (370) |
| 湘灵歌 | (371) |
| 无题二首 | (373) |
| 送增田涉君归国 | (375) |
| 好东西歌 | (376) |
| 公民科歌 | (377) |
| 南京民谣 | (378) |
| “言词争执”歌 | (379) |
| 无题 | (381) |
| 偶成 | (382) |
| 赠蓬子 | (383) |
| 一二八战后作 | (384) |
| 自嘲 | (385) |
| 教授杂咏四首 | (386) |
| 无题 | (388) |
| 所闻 | (389) |
| 无题二首 | (390) |
| 答客诮 | (392) |
| 赠画师 | (393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二年元旦 | (394) |
| 题《彷徨》 | (395) |
| 题《呐喊》 | (396) |
| 题三义塔 | (397) |
| 悼杨铨 | (399) |
| 无题 | (400) |
| 赠人 | (401) |
| 悼丁君 | (403) |
| 无题 | (404) |
|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| (405) |
| 无题 | (406) |
| 报载患脑炎戏作 | (407) |
| 无题 | (409) |
| 秋夜有感 | (410) |
| 亥年残秋偶作 | (411) |
| 佚文 | (412) |
| 重订《徐霞客游记》目次并跋(1901年) ··· | (413) |
| 挽丁耀卿联(1902年) ··· | (415) |
| 《域外小说集》第一册广告(1909年) ······ | (416) |
| 《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》跋 (1924年) ······ | (418) |
| 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校后记(1924年) ··· | (419) |
| 《阿Q正传》赌博图解说明(1932年) ······ | (421) |
| 题《唐宋传奇集》赠增田涉(1934年) ······ | (423) |
| 草拟《汉画像集》目录(1935年) ······ | (424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佚 简 | | (426) |
| 致胡适(1923年12月28日) | | (427) |
| 致江绍原(1927年7月12日) | | (429) |
| 致江绍原(1927年8月17日) | | (431) |
| 致江绍原(1928年4月13日) | | (433) |
| 致郁达夫(1928年12月12日) | | (434) |
| 致宋庆龄、蔡元培(1933年1月21日) | | (435) |
| 致(朝鲜)申彦俊(1933年5月19日) | | (436) |
| 致(日本)森三千代(1934年3月17日) | ... | (437) |
| 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电文(1936年春) | | (438) |

集外诗文选

(下)

文艺与政治的歧途

—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

本篇作于 1927 年 12 月 21 日，记录稿首

次分两期发表于 1928 年 1 月 29、30 日上海
《新闻报·学海》第一八二、一八三期，署周
鲁迅讲、刘率真记。后收入《集外集》时经
作者审订。

这一篇与《关于知识阶级》题旨相同，
都是讲知识文化与现实的关系。文章曲折隐
晦地抨击了国民党对进步文艺及文艺家进行
的摧残、迫害。鲁迅指出“文艺和革命原不
是相反的”，两者之间有“不安于现状”的共
同性，都是要催促旧的灭亡、新的诞生。只
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，才出现文艺与政治的
歧途。他鼓励文艺家要向十九世纪的批判现
实主义文艺学习，而不要去模仿、效法那种
十八世纪专供太太小姐们消遣的英国文艺。

* * *

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；今天到此地来，不过因为说过好几次，来讲一回也算是却一件事。我所以不出来讲演，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，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，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，我更不能讲什么。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，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人物，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，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；后来，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，到北京后，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，觉得并不怎样高明。

我没有整篇的鸿论，也没有高明的见解，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。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；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，两者之间，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。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，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。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，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，只有一段短短历史。政治家最不喜欢大家反抗他的意见，最不喜欢人家要想，要开口。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，又没有人开过口。且看动物中的猴子，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；首领要它们怎样，它们就怎样。在部落里，他们有一个酋长，他们跟着酋长走，酋长的吩咐，就是他们的标准。酋长要他们死，也只好去死。那时没有什么文艺，即使有，也不过赞美上帝（还没有后人所谓 **God** 那么玄妙）罢了！那里会有自由思想？后来，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，渐渐扩大起来，所谓大国，

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；一到了大国，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，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，许多不同的问题。这时，文艺也起来了，和政治不断地冲突；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，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；文艺虽使社会分裂，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。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，那就不免被挤出去。外国许多文学家，在本国站不住脚，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；这个方法，就是“逃”。要是逃不掉，那就被杀掉，割掉他的头；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，既不会开口，又不会想了。俄国许多文学家，受到这个结果，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。

有一派讲文艺的，主张离开人生，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（在中国又不同，有国粹的道德，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，当作别论），或者专讲“梦”，专讲些将来的社会，不要讲得太近。这种文学家，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；但是“象牙之塔”毕竟不能住得很久的呀！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，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。打起仗来，就不能不逃开去。北京有一班文人，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，他们想，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，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？现在呢，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，还是要逃到南边来；“象牙之塔”的窗子里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！

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，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，逃的逃了。别的文学家，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，又不能不反对，不能不开口，“反对”“开口”就是有他们的下场。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，亲身所感到

的，便影印到文艺中去。挪威有一文学家，他描写肚子饿，写了一本书，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。对于人生的经验，别的且不说，“肚子饿”这件事，要是欢喜，便可以试试看，只要两天不吃饭，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；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，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。我们有钱的时候，用几个钱不算什么；直到没有钱，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。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，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，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，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。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，他身边什么都光了，时常抽开抽屉看看，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；路上一处一处去找，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；这个情形，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。

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，一到了有钱，容易变成两种情形：一种是理想世界，替外同一境遇的人着想，便成为人道主义；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，从前的遭遇，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，便流为个人主义。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。主张人道主义的，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，改变改变现状，在政治家眼里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；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，反对战争，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——那部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他自己是个贵族，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，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，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（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），更有刺心的痛楚。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，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。战争的结果，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：一种是英雄，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，只有他健存，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，

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。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，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。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，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。他这么主张，政府自然讨厌他；反对战争，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；主张无抵抗主义，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，警察不替皇帝执法，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，大家都不去捧皇帝；皇帝是全要人捧的，没有人捧，还成什么皇帝，更和政治相冲突。这种文学家出来，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，这样批评，那样批评，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，都不安起来，自然非杀头不可。

但是，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，他不过感觉灵敏，早感到早说出来（有时，他说得太早，连社会也反对他，也排轧他）。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，行举枪礼，照规矩口令是“举……枪”这般叫，一定要等“枪”字令下，才可以举起。有些人却是一听到“举”字便举起来，叫口令的要罚他，说他做错。文艺学在社会上正是这样；他说得早一点，大家都讨厌他。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，心想杀掉他，社会就可平安。殊不知杀了文学家，社会还是要革命；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，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？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，潦倒地过了一生，直到死后四五十年，才为社会所认识，大家大闹起来。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，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；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，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。在座诸位的见解，我虽然不知道；据我推测，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；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，偏见如此，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。

到了后来，社会终于变动了；文艺家先时讲的话，渐渐大家都记起来，大家都赞成他，恭维他是先知先觉。虽是他活的时候，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。刚才我来讲演，大家一阵子拍手，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；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，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，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。上面我讲过，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，许多观念，文学家早感到了，社会还没有感到。譬如今天××先生穿了皮袍，我还只穿棉袍；××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。再过一月，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，在天气上的感觉，相差到一个月，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。这个话，我这么讲，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。我在广东，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——现在的广东，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，是非“打打打，杀杀杀，革革革，命命命”，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——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，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。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，正在革命中，那有功夫做文学。我们且想想：在生活困乏中，一面拉车，一面“之乎者也”，到底不大便当。古人虽有种种田做诗的，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；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，他才能吟他的诗；真要种田，就没有功夫做诗。革命时候也是一样；正在革命，那有功夫做诗？我有几个学生，在打陈炯明时候，他们都在战场；我读了他们的来信，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。俄国革命以后，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；这时，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；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，那有功夫去想文学？等到有了文学，革命早成功了。革命成功以后，闲空了一点；有人恭维革命，有人颂扬革命，这已不是革命文学。

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，就是颂扬有权力者，和革命有什么关系？

这时，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，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，又要出来开口。从前文艺家的话，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；直到革命成功，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，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，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，或是割掉他的头。割掉他的头，前面我讲过，那是顶好的法子咯，——从十九世纪到现在，世界文艺的趋势，大都如此。

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，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。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，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，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。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，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。我们看了，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，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。这是因为以前的文艺，好像写别一个社会，我们只要鉴赏；现在的文艺，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，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；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，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；以前的文艺，如隔岸观火，没有什么切身关系；现在的文艺，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，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；一到自己感觉到，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！

十九世纪，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；所谓革命，那不安于现在，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。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（旧的消灭，新的才能产生），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，还是处处碰钉子。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，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；在徐州以南，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，即共了

产，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。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。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，是革命文学家；打倒军阀是革命家；孙传芳所以赶走，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，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“孙传芳呀，我们要赶掉你呀”的文章赶掉的。在革命的时候，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，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；革命以后，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于是他又要吃苦了。照他们这样叫，啼，哭都不成功；向前不成功，向后也不成功，理想和现实不一致，这是注定的命运；正如你们从《呐喊》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；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，我却没有穿洋服，头发也这样短短的。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，一定不是革命文学，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？除了吃麻醉药！苏俄革命以前，有两个文学家，叶遂宁和梭波里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，直到后来，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，那时，苏维埃是成立了！

不过，社会太寂莫了，有这样的人，才觉得有趣些。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，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，或是绑出去砍头，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，都可以热闹一下子。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，大家围着去看，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，但看见人家挨打，倒觉得颇有趣的。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！

今天所讲的，就是这么一点点，给它一个题目，叫做……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。